

警察照片吓小偷的治安反讽

■今日视点

在家里显要位置挂自己当武警时的照片、借警察帽子放在私家车显眼位置……为了防小偷，广州人可谓是挖空心思破了头。

(1月23日《信息时报》)我宁愿将之视作广州人的一种幽默创意，恰如陕西农民工贺卡讨薪一样的效用。只不过广州人的幽默背后隐含着对社会治安不靖的无奈和反讽，是一种民意的宣泄和表达。

这个信息被舆论捕捉，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社会治安的担责者，应该从中体恤民意的内涵，解决不容乐观的社会治安问题。

而就在不久前，广州市一位领导还将社会治安问题归咎于媒体。显然，这种判断充满了偏颇。

广州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的大关，单纯从数据而言，已经跨入了现代化的门槛。不过，国人对之充满了怀疑，关键问题就是民生质量和人均GDP间的不相符合。所谓民生质量大而言之是“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小而言之就是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应该是安居乐业的一个因素。广州居民绞尽脑汁去防盗，显然不能说是安居乐业。因而，广州居民的防窃之招，不仅折射了广州社会治安的窘况，更昭示着广州现代化之路任重道远。

对于广州社会治安的状况，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解读。省十届人大代表在视察广州各区社会治安情况后，表示广州治安状况为五年来最佳。(2006年12月17日《南方都市报》)而同期在几所高校所做的调查则显示有八成多的大学生对广州的社会治安不满意。

出现治安问题并不可怕，怕的是对治安问题源头的误判。从去年钟南山院士被抢引发的治安争议，到不久前广州市酝酿的拒绝低素质人员准入的人口政策。广州市在很大程度上将外来人口视作了社会治安难题的乱源。且不说这种判断是否正确，但每个城市都必须正确

面对人口大幅流动的严酷现实。公共管理部门既不能将这部分人群驱离，也不可让这部分人群边缘化。否则，就会使这部分人群产生逆反心理，造成社会治安的诸多难题。广州作为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又是最接近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必须在城市管理上搜索出一套惠及所有人口的新政策来。

同属发达国家，加拿大的外来人口融合政策使得加国城市的治安良好，法国的外来人口边缘化政策则引发从巴黎蔓延至全国的城市暴乱。广州可从上述国家的城市人口政策中得到借鉴，以求得社会治安状况的彻底好转。

(张敬伟 江苏 公务员)

■异论锋生

“以官治官”不止 “求见领导”不绝

1月23日，两则有关“市委书记”的新闻成为网络转载的热点。一是据《人民日报》报道，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日前说，轻率地视百姓为“刁民”，就不可能化解矛盾，赢得民心，确保社会长治久安；二是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一男子在街头两次举刀欲自残，声称要见市委书记。

先从第二则新闻说起。这名男子说，去年，他在打工的饺子馆里被老板的儿子打伤了手脚，现在，老板将他赶到了大街上，不给吃、不给住。他说，自己找过公安部门，但一直没有结果，这才决定作出此举。事情很简单——这名男子发现自己走不通正常的维权道路，于是希望通过“以官治官”的途径解决问题。可是，“官”不是想见就能见的，所以他要制造点轰动效应。

“以官治官”的路子不通？看看第一则新闻就明白了。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说，到任1个月，他发了3件表扬通报：一件是华凌管道破裂，当时报需停暖36小时，该市领导终止会议来到现场，请当事部门提出加速解决的几种方案，结果仅11个小时就恢复了供暖；第二件是解决天山区、达坂城区农民上访，这件事拖了40年了，栗智请市长责成两城区5天之内解决，之后，这两个区用半天时间就解决了；第三件是封来信，是个办理户口迁移的问题，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栗智看了信后，批给政法委，用了3天，事情解决了。

3件事中，“现场办公”“责成处理”“批示办理”，正好是领导督促下级办事的3种常见手段。从效果来看，简直到了“神速”的地步。在这种“领导出手，无往不利”的现象之下，走不通正常的维权道路的那名男子，想方设法“求见领导”自然就不奇怪了。形成惯性之后，“求见领导”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以官治官”就会没完没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对栗智“发了3件表扬通报”非常不以为然——“快速”的就表扬，那“慢速”的是否被批评甚至追究责任了呢？不把“慢速”的原因揪出来，难道让人寄望于每次都劳你出面处理吗？领导每处理一件事情，都应该问一问：下级为什么处理不了这件事情？下级是麻木不想做，或是遇阻无力做，甚至是因猫腻而不做？领导通过制度解决了下级的这些问题，才是百姓的福音。

(李知雅 广西 职员)

嫖娼费与“性贿赂”是两码事

■公民发言

2006年12月24日，景宁县检察院以受贿罪对浙江丽水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温某提起公诉，将温某收受丁某的9500元嫖娼费计入受贿额。

(1月23日《检察日报》)初读新闻，我和很多人的感觉一样，觉得温某因为接受了他人的嫖娼费而定为受贿罪，似乎是司法机关在推动性贿赂入罪上迈进了一步。然而仔细分析却发现，嫖娼费与“性贿赂”根本就是两回事。

请看报道：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丁某将钱直接放

在温某所住宾馆房间的枕头下，由温某自己支付。从这一报道我们可以看到，丁某是将钱直接给了温某，只不过是温某将这些钱用来买“性”而已，这种受贿跟通常的受贿没有任何区别。

“性贿赂”是指本人或利用他人向人提供“性服务”的“贿赂”行为。在“性贿赂”中，行贿一方是付出了“性代价”，受贿一方是得到了“性服务”。“性贿赂”之所以引发争议以及不好入罪，主要在于我国法律中将受贿罪的对象界定为“财物”，而“性服务”却比较抽象，不好计算其价值。

正因为“性贿赂”入罪

存在争议，而对“性贿赂”入罪在各国先例可循，我们才希望司法机关进行积极探索。但景宁县司法机关没有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因为当需要他们运用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推进“性贿赂”入罪时，他们退步了。比如丁某起初“宴请”温某的近20次嫖娼，都是由丁某预先支付了费用，按理说，温某接受的这近20次嫖娼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财产性利益”，应当计入其受贿数额。但景宁县司法机关却以这种行为属于“性贿赂”，存在争议为由，没有将其计入受贿数额。这才真的令人遗憾不已。

(杨涛 江西 检察官)

当心煤炭业“巨无霸”的垄断

■公民发言

日前，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煤炭工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发改委表示将重点支持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整合中小型煤矿，在2010年前，中国煤炭业重组将以建设“巨无霸”企业集团为基调。

(1月23日《第一财经日报》)我更关心的是，跨地域煤炭业巨无霸集团，会不会形成新的垄断格局？通过兼并中小型煤矿，能不能真正

起到遏制矿难的功能呢？这样的资源整合，本身就必须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加之由极少数企业垄断整个煤炭市场，那么，这样的资源整合成本，又会不会加到煤炭价格之上呢？

如果煤炭价格不断提高，则必然引发“连锁反应”，造成电力、交通等其他行业的涨价，而这一切最终只能还是由消费者来埋单，由此加重了民生负担。

在担心垄断之外，我们也有期待。那就是，煤炭行

业的资源整合与改造升级，能不能对矿难频发现象起到根本性的遏制作用？“容易出安全事故的，大多数是小煤矿”，这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现在，通过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整合中小型煤矿，可以有效地厘清当前煤炭产业的种种产权不清问题，一旦出现责任问题，也就可以及时确定责任主体，这本身也是对煤矿开采企业的监督与约束，更给了我们一丝遏制矿难的信心。

(单士兵 江苏 职员)

国家愿“让利”才会有税负公平

■热点纵论

1月23日的《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当天表示，年收入12万自行申报截至目前北京只有不到8000人进行了申报。而对于不同家庭负担情况分别征税将是下一步税改的重要方向。王纪平说，考虑到社会的公平，核算基础应该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好。对于负担不一样的家庭，缴税的时候应该考虑。有的市民这个月先预交，但是下个月不能预测是不是出事，如果有一些事情不够税率了，地税局年终可以退还。

严格来说，个人给国家缴税是双方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个人及时缴税固然是一种义务，国家的税收政策最大限度保证公平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义务。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家只是过于强调了个人缴税的义务，而忽视了税收政策保证公平的重要性。体现在具体政策上，就是不考虑纳

税人家庭负担情况各异的一刀切税收政策，只要你的收入达到了起征点就得缴税，这在事实上造成了巨大的税负不公——一个月入5000元的人，他也许要承担一家几口人的生活，一个月入4000元的人，却可能没有家庭负担。但体现在缴税上，却是家庭负担重的人缴的税更多，结果是，他多尽了对国家的义务，对其家庭的照顾能力却被严重削弱了，这对具体的家庭和整个社会，无疑都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对不同家庭负担情况分别征税”的提法正是体现税负公平的正确改革思路。这样的税政取向，不仅将在事实上保障税负公平，更能激发普通百姓向国家报税的热情——如果他们知道报税是以公平税负为前提的，年收入12万自行报税者绝不止现在这么少。

事实上，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到“区别征税”的改革

意向了，在2006年的12月6日，王纪平就曾表示，未来征收个人所得税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整体收入，做到实质公平。个人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满足相关条件的，税务部门也将退税。相隔时间不长，内容却大同小异的两次表态，我们愿意将其理解成税政方向在决策层已经形成共识的积极信号。

税政的改革，其实是国家和个人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一刀切的征税政策，可以保证国家最方便地征收到最大限度的税款；如果改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区别征税政策，不仅征税的过程将变得比以前繁杂，而且很有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总税款下降的情况。税务部门勇于承担更繁杂的征税工作，国家愿意向纳税人让出部分税款，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区别征税才有可能成为现实，而不仅仅是一个构想。但愿，这一天不要让我们等得太久。

(易其峰 江苏 职员)

感恩父母也不必磕头



■漫画天下

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给学生布置主题为“亲情寒假、感恩父母”的寒假作业，内容之一就是给父母磕一个头。

(1月23日《河南商报》)中国自古讲“孝道”，如今有人愿意重提“孝道”，并要求学生用一定的行动来体现对父母的感恩之情，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诸如磕头之类的礼节，难免有“形式主义”之嫌，我看还是免了。

长辈最缺少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这才叫孝道。或许是生活的保障，或许是情感的交流，或许是一声问候，或许

是一封家书……一个在心里并不尊敬父母的人，纵然磕得头破血流也枉然。就像有些人，长辈生前他不讲孝道，等长辈死后却搞风光大葬、大摆酒席、请草台班子来吹吹打打。讲孝道就要磕头，跟这种行为一样毫无意义。因此，相比而言，磕头表孝道的建议，远没有一首流行歌曲讲得实在可行：《常回家看看》。“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就现在的大学生而言，跟父母保持这种情感上的交流，似乎才是当务之急。

江宜/文 刘道伟/图

警惕房价逼出社会临界点

■公民发言

1月22日《中国青年报》上的两则调查结果，既令人悵然又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其一，两年前的调查发现，58.9%的公众相信房价能得到有效遏制，而今天，这一比例已下滑至20.6%。其二，调查显示，96.8%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中国房市存在泡沫。

这可以让我们得出两个结论：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房价能得到遏制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房市泡沫迟早要破灭了。两个结论不仅不突兀反而互有关联，正因为房价得不到有效遏制，公众的信心才大打折扣；正因为公众的悲观预期有现实依据，公众才认为房市存有泡沫并且行将破灭。

房市不容乐观、房价依然高企，这是不争的事实。经过一系列组合拳后，各地房价仍

然扶摇直上，这不啻于对调控政策的戏谑，更是对公众信心的打击和折磨。由此来看，公众的悲观、沮丧和绝望并不是矫情。房价持续高攀难免带来两大恶果。其一势必卷入泡沫化的深渊，楼市果真泡沫化，将是一场灾难，最终买单的势必不仅仅是老百姓。其二会扩大阶层对立。有调查显示，公众不满的注意力已发生转移，“除了开发商的因素之外，多数公众更倾向于把目前房价过高的原因归结于政府调控不力”。公众不满的范围越延展，越让人感觉这是不祥之兆，因为谁都知道不满终将预示着什么。

只有房价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公众的信心才不会彻底被吞噬。房价的调控效果有多大，公众信心的回升幅度就会有多大，也才会早早远离可怕的临界点，这是多赢。(石朝云 安徽 职员)

谁的“住房补贴”最该被呼吁

■公民发言

一则《处级干部家庭正常收入亦难供房》的报道引发了不少公务员的共鸣。1月22日，广州市政协委员黄秉雄表示，一个家庭哪怕有两位市级工作人员，25年的房补也不够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他呼吁广州应该尽快完善机关单位住房货币补贴政策。

(1月23日《南方都市报》)公务员是收入较高的职业群体，连“处级干部”都买不起房，普通市民的住房消费压力又有多大？公务员的住房补贴较低，而那些尚没有住房补贴可拿的企业职工、教师等大多数人群，又将情何以堪？作为政协委员，在这一问题上，首先没有想到大多数民众的“疾苦”，而是少数公务员的“补贴”，令人遗憾。不是说“公务员的住房补贴问题”不值得呼吁，但同样面对高房价，收入稳定且较高的公务员与普通民众，谁的压力最大、

谁的“住房补贴”最该被“呼吁”，不言而喻了。

看报纸、上网浏览新闻，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奇特”的景象：医疗界的政协委员纷纷为医疗高收费“诉苦”，教育界的人大代表时时对教育乱收费“抱怨”……每逢“两会”，一些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代表委员们手中的“提案”，所反映的多是本行业的利益保护问题。建言献策，自然是熟悉的领域才更有发言权；但反映民生，却不能只看到“小团体的一片天”，不能把公众所赋予的“建言权与监督权”，视为行业利益、部门利益乃至小团体利益的“麦克风”。

从这个角度看，“政协委员”为谁呼吁是个问题。从他们的“呼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履行职责的态度——是“独善其身”为小我利益代言，还是“兼济天下”为大众利益呐喊。(王艳 山东 职员)